

社会语境中的文本

——
二战后英国小说研究

阮炜 著

科学文献出版社



社会语境中的文本

——二战后英国小说研究

● 叶 炜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语境中的文本:二战后英国小说研究/阮炜著.-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1

ISBN 7-80050-962-1

I. 社… II. 阮… III. 小说-文学研究-英国-现代-1945
IV. 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7771 号

社会语境中的文本

——二战后英国小说研究



著 者:阮 炜

责任编辑:汤 兮

封面设计:孙元明

责任校对:张景秋 王瑗丽 范 迎

责任印制:窦建中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人民文学印刷厂

开 本:850×1168毫米 1/32开

印 张:9.375

字 数:240千字

版 次: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2000

ISBN 7-80050-962-1/I·102

定价:1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得到深圳大学跨世纪
学术带头人培养计划的资助，
在此谨表示感谢。

序

陆建德

二战正酣时，乔治·奥威尔颇自豪地说，如果英国人在绘画和舞蹈等艺术上比欧陆国家逊色，他们在文学上的成就不会输于任何民族。二战结束至今已逾半个世纪，英国在世界舞台上成为“下沉的小岛”已是定局，但是其文学状况又如何呢？阮炜的《社会语境中的文本——二战后英国小说研究》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当然，1945年只是一条人为的界线。英国的小说创作在二战结束后并没有任何根本性的转变。有些作家（如伊夫林·沃和格雷厄姆·格林）早有文名，他们在30年代就不想高攀“现代主义”的时尚，二战后依然我行我素。在50年代仍然操“现代主义”官话的恐怕只有贝克特一人，当时的英国文学要是有什么特色的话，那就是对实验风格的抵制。不论是“愤怒的年轻人”还是“运动派”都缺乏一种一鸣惊人的欲望，他们把目光投向传统的写作手法和社会生活场景，在平常中寻觅新奇。这或许恰好反映了英国文学总的特色。批评家、小说家戴维·洛奇在文集《十字路口上的小说家》（1971）说，“英国的文学思维特别重视写

实，反对非写实的形式。”当我们回顾“小说的兴起”（依恩·瓦特语）时，我们不难发现，关注外部经验世界、着意再现社会生活规范正是18世纪英国小说的基本特点。

和美国“鄙德”派（Beats）的“嚎叫”（金斯堡诗名，这位精力过剩的金斯堡居然也会作古，就在今年）相比，50年代的英国文坛也许略显沉闷。公开声明要从现实生活中汲取人生养料的作家中也不乏庸才。从60年代开始，文体实验的热情重新爆发，B.S. 约翰逊、约翰·福尔斯、约翰·伯杰和安吉拉·卡特等一大批英才相继涌现，但是复杂多变的叙事视角与手法很快被吸入已有的文学传统，人们在意识到某种危机的时候又突然发现，种种对小说这一文类的或温和或矫激的挑战无非是丰富了小说创作，加深了人们对小说的认识。一些来自法国的概念（如巴尔特的“可读”与“可写”）流行一阵后又归沉寂，当今大多数英国作家和普通读者并不十分关心理论的喧嚣。

阮伟对实验手法的态度实际上反映了英国文学研究批评界的主流特点。他在1993年出的论文集《危机中的文明》中写道：“小说能否‘生存’，关键在于能否把社会、道德关怀与不断更新的艺术表现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本书中，他又表示，文学并不是不依外力存在的自为因果的结构，社会历史的实在总会设法进入文本世界，而那些以形式实验本身为终极目标的作品只会把艺术创作引向死胡同。他呼吁，为防止小说的玄学化、天书化和皇帝的新衣化，理论热应该适度降温，小说不能被贬为某些认识论概念的奴婢。从近几十年的英国小说来看，比较成功的作品往往使形式实验与道德关怀相辅相成，而叙事模式的变动乃至颠倒大都包含了激进的意识形态。

本书结构新颖，读者可以在书中各取所需。我本人最爱读文

本分析部分，那些可以独立成篇的分析是本书的精华所在，充分表现了作者在本世纪英国小说研究领域的深厚功力。作者说，他注重作品的社会历史内涵，对作品的手法、技巧着力不够。我以为这是自谦之词，从（比如说）评析朱利安·巴恩斯的《福楼拜的鹦鹉》的文字来看，作者对小说叙事特色的分析层层推进，十分精彩。现在，个别外国文学史作者对作品的内容所知甚少，凭了一些二手资料拼凑文字，“专著”称得上是“剪刀加浆糊”（柯林伍德语）的历史。相比之下，阮炜在细读上所下的功夫尤其引人注目。不过书中有些说法也有商榷的余地，例如：《幸运的吉姆》是不是嘲讽“精英文化”？是否可以把阿尼塔·布鲁克娜的《天意》中比肖普教授看中漂亮的“差生”简·费厄查尔德解释为学者放弃自主性、投靠大资产阶级？二战后英国小说里有很多关于单身女子的细致刻画，《天意》中的基蒂也许可以被视为那类女子的群像里相当出色的一位。

这部著作中论及的不少作品都涉及到人性的阴暗面，我以为就此而言本书对从事中国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人来说也值得一读。中国一些作家本世纪以来抱了一种一般被称作“强烈的社会批判”的精神控诉黑暗的社会和吃人的历史。这类作品的潜在前提是：一旦压制人性的社会枷锁被打破，人们就可以进入自由王国；人的本性是善的，只是罪恶的制度把它扭曲了。黑格尔曾说：“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伟大得多的思想。”我倒不是说对“恶”是不是推动了历史感兴趣，我想到的是在人性之恶这个领域的挖掘上，中英作家存在较大差异，而对人的本性的不同认识，又会影响到对某些作品的评价与欣赏。且以威廉·戈尔丁的《品切尔·马

丁》(1956)为例。马丁所在的驱逐舰在战争中被敌方鱼雷击沉,马丁独自在大海里的一块礁岩上为求生存而苦苦挣扎。此时的他具有种种英雄的品性:超人的忍耐力和拒绝听由命运摆布的决心。他甚至自称是与老天抗争不已的“普罗米修斯”。但这位求生欲望强盛得催人泪下的英雄在社会生活中却是不折不扣的恶徒,戈尔丁这样形容马丁与命运的顽强搏斗:“他在一个由自己凶恶的本质构成的世界上继续存在下去。”我提到这部小说,不是说它如何优秀,我想强调的是,我们感到容易接受的恐怕是那种像西西弗斯一样推石上山、永不止息的存在主义英雄,是海明威《老人与海》里那位百折不挠的古巴老渔民桑提亚哥。戈尔丁则告诉我们,坚韧不拔未必是什么值得敬重的美德。

“小说之死”和“故事之死”几十年来不绝于耳,但阮炜这部新作显示,小说的活力还强劲无比。叫“狼来了”的人有时真正的目的并不在吓唬老百姓,他或许是在表示一种真诚的愿望:狼呀狼,你快来!要叫死唱衰小说者暗中企盼“心想事成”(英文里叫“self-fulfilling prophecy”)。目前的趋势证明小说这一文类的包容性越来越大,虚构故事的冲动并未因为某些故意回避故事的实验性小说的出现而有所减弱。阮炜在书中说,因着巴恩斯的机智诙谐,《福楼拜的鹦鹉》有可能为将来的英国小说树立榜样,使之“向法国型实验小说更加靠近,或进一步非小说化或非故事化”。我以为这种可能微乎其微,法国式实验小说(真的这么了不起吗?)的影响不致决定历史悠久的英国小说的发展方向。实验手法并不是一条单行道,作家一踏上就“义无反顾”。虽然巴恩斯在80年代创作了形式新颖的《福楼拜的鹦鹉》和《一部十章半的世界史》,他在1992年推出用所谓19世纪“全知全能”叙述方式写成的小说《豪猪》,又根据东欧八、九十年代之交的

历史背景讲起故事来。显然，小说的“非小说化”、“非故事化”或小说之死离我们还极其遥远。巴恩斯的这段话我以为可以用作结论：

好久以来，人们周期性地宣告上帝的死亡和小说的死亡。这都是危言耸听。由于上帝是人们虚构故事的冲动所创造出来的最早的、最好的艺术形象，我愿把赌注押在小说上——不论它是何种变异的文本——我相信，小说的寿命甚至会超过上帝。（瞿世镜译文）

亭林先生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序。”明知故犯者愧疚之情不必言表。是为序。

一九九七年八月十四日

093830

自序

酝酿《社会语境中的文本——二战后英国小说研究》的写作时，曾考虑过几个较小的选题，如二战后英国天主教小说家，二战后英国学院派小说家，80年代以来的少数民族小说家。因笔者是学院背景，对学院派小说家难免情有独钟，故搜集材料时，他们一度几成最后选择。之所以最终仍决定写一个较大的题目，有以下原因。首先，是否真存在着一个学院“派”，抑或只有一些具有学院背景，写学院生活，且气味相投的小说家？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不能把他们作为一个“派”来研究。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国学界目前对二战后英国小说的了解还远远不够，远不如对二战前和19世纪的研究来得深透，在这种情况下，一下子进入一个狭窄的题域，似有未打基础便要盖房之嫌。另外，学院背景的小说家如大卫·洛奇、马尔科姆·布拉伯里，或C.P.斯诺、早期金斯利·艾米斯与同时期非学院背景的小说家相比，思想深度和艺术手法均较为逊色。他们对学院人士和学院生活的讽刺挖苦虽来得痛快，有时也难免流于泄私愤、报私仇，颇小家子气。原因可能很简单：他们有教书育人的任务，还有在学术上独树一帜的负担（斯诺甚至还出任过高级公务员），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学院在“后现代”情势中的尴尬似乎并没有真切的把握。

因此，如果专写学院派，而不把众多非学院背景的小说家系统地介绍给中国读者，显然是一大遗憾。如果不介绍 80 年代以来新一波实验浪潮中的新小说家，就更加失职了。新一代小说家并非没有其问题，但在探索一条讲老实故事和形式创新相结合的路子方面，他们中一些人毕竟把英国小说推向了新的高度。

当然，所谓“系统全面”，只可能是相对而言，限于篇幅、精力和所能得到的材料，“系统全面”显然得打折扣。笔者能做到的事，只是尽可能将最突出的作家和作品介绍给我国读者，但即使这样，也难免会出现疏漏和偏颇。安东尼·伯吉斯恐怕便是这样的例子：他具有天主教背景，思想广博而有深度，语言机智诙谐，而且有非常强烈的实验意识，创作量也颇为不小，从哪方面来看，伯吉斯都显然是一个重要的二战后英国小说家。由于同样的原因，安吉拉·卡特也未收入本书。如果说未能将伯吉斯和卡特收入更多是由于客观原因，那么作为“乔学”末流的塞缪尔·贝克特之被排除在外，原因就主要是主观的了。贝克特在战后虽仍从事小说创作，可是他宁愿继续躲在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1939）的树荫下释放他的创作能量，而非试图摆脱学徒期、在内容和风格上真正长大成人。此外，贝克特带着他那深深融入其血液中的法国情结，过度认同于法国文学传统，已在很大的程度上偏离了英国小说创作的主流。结果（当然并非必然有此结果）是，他的作品过于荒诞，大大超出了笔者愚拙头脑的领悟能力。

80 和 90 年代还有一大批少数民族小说家活跃在英国文坛上，如香港裔的蒂莫西·牟（Timothy Mo）、日本裔的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特里尼达出身的 V.S. 奈珀尔（V.S. Naipaul）等人，都是其中的佼佼者。阿亚图拉·霍梅尼对之下过追杀令的

印度裔的萨尔曼·拉什迪，就更具有全球知名度了。本书之所以未能将这些跨文化小说家收入，既因受篇幅、精力和材料的限制，也因研究这些作家，需对所谓“后殖民”情景中的文化冲突和融合之大势做深入的思考，需对西方中心论及其破除做深入的思考，而许多问题非常复杂，窃以为我国知识界的思路尚未达到清晰的地步，甚至可以说，这些问题根本就不是思考所能解决的。以拉什迪为例，一方面不能因霍梅尼对他下了追杀令，便盲目采取一种貌似开明自由的立场，跟在西方人屁股后面起哄，另一方面也不能简单地站在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立场上，一味指斥他背叛民族传统文化，亵渎民族宗教感情。他的作品纵然有对民族宗教不恭敬的一面，但也有与西方文化的格格不入的一面。具有伊斯兰教背景的拉什迪从小接受的是西式教育，上中学后又移居英国，结果是他既没有完全被西方文化接纳，又不可能返回祖辈认同的民族文化，这就必然导致他在文化身份上的尴尬。较为平实持中的观点可能是，拉什迪事件（尽管伊朗已撤消对他的追杀令）是近代以来不可避免的文化冲突和融合情势的不幸产物。

《二战后英国小说研究》虽不以学院派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但这并非意味着不能把作为小说家的布拉伯里和洛奇收进来。之所以没有把他们收进来，主要是由于篇幅和精力有限。此外，还有众多不那么有名的小说家被排除在外。在这里，原因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和技术性的。除了不可能万无遗漏地弄到所有有关材料以外（即精力和财力的双重不足），笔者也非常不情愿写一部流水账，而更愿意挑选出一些重点加以突出，尤其是对一些重要作品加以详尽的评论。如果说一些好心肠而且十分仔细的英国学者——如兰道尔·斯蒂文森（Randall Stevenson）和马尔科姆·布拉伯里等人——更愿做得面面俱到，绝无疏漏，那恐怕一

是因为英国有英国的国情，二是因为他们也的确有条件这么做。在中国，就连少数专攻英美文学的专家，也未必应当详尽无遗地了解每一个英国作家的每一部小作品。

上述意向和考虑的最终产物，是书成之后的《二战后英国小说研究》在结构上颇为独特。它不仅按时段分为1945年—1959年（也可谓“新现实主义”时期）、1960年—1979年（不妨叫作“实验主义”时期）、1980年—现在（在此姑且戏称为“新潮实验”时期）三大部分，而且在每一部分里面按内容形式又分为“时代背景”、“作品评介”和“文本分析”三大块。其中“时代背景”的内容是什么不用说，“文本分析”实际上是对单篇作品的细读，只有“作品评介”更像按人头和作品记下的流水账。这一格局并非标新立异的结果，而是不得已而为之。笔者动手写作之前，已有若干有关二战后英国小说的单篇论文发表，如果不对这些“成果”加以综合与改造的利用，岂非浪费？如果《二战后英国小说研究》的写作真要从零开始，自我派定的这一任务势必过于繁重，委实难以承受。当然，懒惰导致的这格局也不无好处：读者不妨把“作品评介”当参考书来查阅，而把“文本分析”作为对重要作品的详评或研究来对待。此外，对特定作品的介绍或赏析，由于材料和精力的限制，也很难做到一碗水端平，而是有详略、有取舍。

无论“作品评介”，还是“文本分析”，说到底都是为了把信息传递给读者，因此不论读者赞成、不太赞成，甚至反对“评介”和“分析”中表露出的立场和倾向，都不会妨碍他了解一些有关二战后英国小说的情况。在一个对知识产权敏感到神经质的时代，以这样的方式来获取信息似已成为一种宿命。就拿金斯利·艾米斯的儿子、80年代登上文坛的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 来说吧, 眼下, 他在批评界、研究界和商业上都越来越走红了。他的“严肃小说”借着英语的全球优势(当然, 语言优势的后面是英语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 已赢得了极大的发行量。其发行量之大, 拿中国标准看是难以想象的。正因为如此, 我国出版单位若要翻译出版他的小说, 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是, 拥有版权的英美出版公司将板起面孔, 要一大笔钱。在这里, 若有不当或不慎, 他们的道德义愤可能悖然发动; 同时, 占有者渴望占有更多的逻辑也不会不起作用。无论怎样, 意识形态热忱和商业获利动机会兼而有之, 都会给他们带来快感。艾米斯的书毕竟不是发行量有限的学术著作, 因而西方人不大可能感到有考虑中国国情的必要。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实际情况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但这猜测并非没有根据。此外, 即使没有知识产权的问题, 中国读者也还有语言障碍的问题; 即使没有语言问题, 也很可能存在手中无文本的问题。基于这些考虑, 传递信息的必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正是由于主导动机是传达信息, 《二战后英国小说研究》颇显得缺乏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 倒更像一部不太全面的二战后英国小说简史, 外加一些作品详评。不过, 即使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主题, 那也不等于本书没有立场和倾向。笔者所更加注重的, 是作品的社会历史内涵, 因此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这上边了, 其结果可能是对作品的手法、技巧着力不够。当然, 如果手法或技巧的分析明显有助于社会历史内涵的阐释, 也不会弃之不用。但更大的问题可能来自这种情景, 即, 对所谓“后现代”小说加以评析, 形式与内容的二分法可能已不适用, 对于 80 年代新一代小说家来说, 就更是如此了。新生代小说之进一步“后现代”化, 势必使文本的阐释更加困难。可能由于这一原因, 也可能由

于文本问世的时间还不长，用英语发表的研究著述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大多十分粗浅。有将“后现代主义”显学化倾向的国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陷井更多，难度更大，当不言自明。

“后现代”情景中的文本已经是如此自足，以至于将社会历史内涵拣选出来加以剖解本身，就可能被判为一种误读。笔者自然不能保证《二战后英国小说研究》一点不含有这样的误读。但文本理论终究是理论，玩可以玩，只是不可过于认真。文本的实在即便是一个不依外力而存在的自因自果的结构，社会历史的实在也不会因这一结构的诞生而自动消失。社会历史的实在总会设法进入后现代文本世界。换言之，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镜子说即便在“后现代”情景中也仍有其功用。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小说的非小说化（当然，这一过程实际上早已开始，谁也不知道它会不会终结，如何终结，何时终结，以何种方式终结），即，玄学化、天书化、皇帝的新衣化。在这里，不仅已没有社会历史实在的所指，连文本实在本身也陷入“有无之境”了。如果我们对皇帝的新衣化的外国货不加选择、不加批判地实行“拿来”，那绝不会使80年代以来一波又一波的西方理论热降温的，而窃以为当前中国知识界所急需的，莫过于对各种“热”实行降温，在一种平正中和的心境中认真省思从而最终重建一种本真的文化主体，在继续吸收新的文化质素的前提下，以民族文化精髓为本，确立一种新的文化自我。

1997年3月16日于深大新村

目 录

序	陆建德
自序	1

上卷 1945 年至 1959 年

时代背景	3
作品评介	17
文本分析	55
I 吉姆的笑——评《幸运的吉姆》	55
II 何为巫师？能否逃离？——评《逃离巫师》	69

中卷 1960 年至 1979 年

时代背景	87
作品评介	104
文本分析	146
I 从社会和历史的视角读《法国中尉的女人》	146
II 世俗世界中的黑暗与光亮——评《黑暗昭昭》	159

Ⅲ 毁灭中的目的——评《司机的座位》	175
--------------------------	-----

下卷 1980 年至 1994 年

时代背景	189
作品评介	200
文本分析	236
I 钱与性的世界——评《钱：自杀者 的绝命书》	236
II 巴恩斯、福楼拜及“福楼拜的鸚鵡”——评 《福楼拜的鸚鵡》	250
III 不幸的基蒂——评《天意》	267